

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的四重纬度*

张新宁

[摘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重点和起牵引作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要坚持“马学”为魂,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是我们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灵魂;要坚持“中学”为体,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导向,积极面对、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坚持以“史学”为鉴,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理论问题的争论,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坚持“西学”为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要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扬弃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成分。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纬度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7)01-0018-08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使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既是重大的战略布局,也体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重点和起牵引作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进一步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笔者以“马学”为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灵魂)、“中学”为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内容)、“史学”为鉴(以历史为借鉴)、“西学”为用(借鉴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为研

究范式,着重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的四重纬度。

一、“马学”为魂:马克思主义政府和 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变以及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以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不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必然灭亡,而且各自勾画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空想社会主义者排斥市场的观点,把商品、货币、市场当作罪恶的根源,认为私有制造成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圣西门设想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人人都要劳动,没有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傅立叶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可以完全消除,并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衡量标准。欧文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

*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17-CX-008]的资助成果、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交锋”[2016-GH-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新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改革社会的理想主张，并于1824年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魏特林认为未来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财富共有共享；统一管理的协作生产；平等的权利；自由的理想；良好的风俗道德；人人节约的习惯；对社会的和谐管理。为了实现和谐社会，需要采取以下制度和措施：取消私有财产权，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取消金钱（货币）和商品；废除继承权；推行能力选举制度；按交易小时制度分配；普遍实施“学习军”教育制度；通过哲学的医学“治病救人”。^{[3](pp.27-28)}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经济上的反市场性、管理上的自治性、教育上的万能性、文化道德的宗教性等特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认识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认识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的思想属于空想的范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与市场进行了设想，认为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面消除商品和货币交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全面的计划调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4](p.757)}“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pp.660-66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囿于时代的局限，尚未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运用市场的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局限性。

在1893—1917年间，列宁没有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商品生产”的个别结论。尽管列宁第一个提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概念，但他坚持的基本公式仍为：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历史上消灭商品—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真正尝试。之后，列宁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利用商业、市场来恢复经济、稳定群众，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

‘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5](p.506)}“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5](p.506)}经过一连串失败，其认识一步一步接近商品—市场关系。“承认错误的益处和必要性就在于此，主张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5](p.221)}这一段反思说明，列宁开始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重大措施应当以市场、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实质上是在思考社会化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同市场的关系问题。他提的课题非常重要，意味着应当把市场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注重克服商品、市场关系的消极因素。他一方面要坚决实行和适应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我们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6](p.737)}这实际上就是要认识和克服商品经济的两重性，重要手段就是法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1929年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在事实上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国思想，逐步形成了代替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模式，排除和限制商品、市场关系，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标志，价值规律只在一定范围内被利用，认为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职能最重要特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服从统一的计划指导。应当说，斯大林的观点是列宁思想的后退，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受严重限制的商品生产论”和“商品外壳论”（即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保持商品的外壳），严厉批判“解放”市场，使市场“常态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这种理论和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逐渐成为高度独裁的政治体制，形成了特权官僚阶层。正是这样的体制，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形成长期的短缺经济，生产力畸形化（重工业特别突出，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7](p.201)}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囿于时代的原因

①马克思在这句话中所说的个体生存斗争正是市场竞争。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有一定局限,但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到需要利用商业和市场来恢复经济、扩大生产,为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经济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斯大林排除和限制商品、市场关系,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导致生产力畸形化,也为我们正确运用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总之,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坚持“马学”为魂。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8]

二、“中学”为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做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从限制、取消市场到利用、发展市场的反反复复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政府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遭到取消和限制阶段(1949—1978年)。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9](p.6)}这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其目的是迅速发展生产,恢复和繁荣城市经济,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探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补课”,打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再来一个“经济政策”20年左右的补课,提出“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为新的市场结构特征。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计划经济体制遇到的重大挫折,导致国家对计划体制进行反思和调整。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有条件地允许小规模的商品关系存在。1962年,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集市贸易是

现阶段中国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必要补充。但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通常显著高于政府制定的同类产品的计划价格,这对于刺激农业生产和调节商品流通起了很大作用。^{[10](pp.417-418)}暂时困难时期,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轻视和消灭商品经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11](p.34)}然而,在提出这些重要观点之后,又出现了一次更大的反复,即为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要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认为这些使得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2](p.1714)}

第二,政府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发挥辅助作用阶段(1978—1992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省份开始恢复曾被强行关闭的农村集市。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原则上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中央政府划定的框框。1980年5月,国务院允许在市区建立永久性的农贸市场。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要求大城市在继续办好农贸市场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沟通市场信息、组织期货交易的贸易中心。至此,城乡之间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趋于完善。在农业发展方面,中央改变了曾严令禁止的包产到户的做法。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认为一些适宜搞包产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不用担心影响集体经济,这些地方的经济主体还是生产队,以后生产发展了集体化水平还会提高。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鼓励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统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集体经营的一个层面,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合法地位。个体的私营经济方面,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进一步放宽了对个体经济的限制。1987年1月,中共

中央发布《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把私营经济定位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提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可以依照政府制定的法律和规章,注册登记和从事经营活动。在这一阶段,中共中央不断探索完善的经济体制。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3](p.350)}我国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一阶段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的突出特点是,重视价值规律作用,逐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4]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2013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3](p.659)}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指导,正确发挥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各自优势,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凡是市场调节能解决的问题就由市场去解决,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计划调节主要搞好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难以达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抑制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例如,党的十五大之后,中央政府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大幅度收缩国有经济的进入范围,集中控制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和关键领域,对于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经过破产、兼并和改制,改造成民营性质的股份公司。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国有企

业需要控制的主要行业和领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国家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5](pp.1348-1349)}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15](p.1723)}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p.15)}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

第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阶段(2013年至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1]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讲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表明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之所以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讲,是为了“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7](p.71)}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决定》同时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7](p.16)}这为我们正确处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指明了方向。首先,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

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就是明确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职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其次,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职能交给市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充分用足“看不见的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坚持“中学”为体,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阶段,既坚持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又化解了前进中的矛盾;既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阻碍,又支撑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三、“史学”为鉴:理论界对政府和 市场关系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争论,主要基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围绕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问题、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理论问题展开。

第一,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研究基本上是以苏联经济理论为模式,暂时“保留”逐步过渡为产品经济的生产形式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一些卓

越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商品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并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做了大量探索。这时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于光远是我国较早认识到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的经济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于光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存在的三种买卖关系,即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国家和职工之间、国家同企业之间的买卖关系,这三种关系都应称之为商品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于光远开始系统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将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著名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改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18](p.169)}许涤新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直持肯定态度,认为商品关系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但必须利用商品和货币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坚决反对把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相等同并加以排斥。二是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于光远就十分重视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研究,认为其客观性质只是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要靠计划来指导、来调节,如果有正确的计划,就能够顺利地、迅速地发展;如果没有计划,或者计划严重失算,就不能发展,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存在下去”。^{[18](p.19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光远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探索。他特别强调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指令性计划是必须实行的,指导性计划是参照执行的。实行指导性计划必须运用经济杠杆。三是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关系的问题。许涤新认为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是统一的,这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依据。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键是要能够正确认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孙冶方认为,应当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价值规律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商品生产的特有规律。卓炯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认为价值规律有极高的科学性和很大的优越性,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杠杆。四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关系的问题。于光远指出,既然有计划

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那么,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就应当和市场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孙冶方认为我国计划体制原则应是“大计划、小自由”,就是属于价值范畴的指标,必须集中管理,属于使用价值范畴的指标,应该分头分级下放管理,但规定不应太死,要按照客观需要随时调整。许涤新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宏观上由国家计划控制平衡,微观上主要由市场来调节。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采取计划商品经济模式。薛暮桥认为,过去我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最大缺点,是用行政管理来代替经济管理,只有计划调节,缺少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强市场调节。

第二,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问题(21世纪初)。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3](p.351)}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p.373)}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能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主张市场经济必然与私有化相联系,把“市场化”绝对化,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以至滑到“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那边去。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要“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20]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应当选择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主张的“市场最优性经济”,不要政府的主导作用,靠“‘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21]他们的基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的,重复了国际上已经破产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不仅逻辑

上自相矛盾,而且与事实大相径庭。我们决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名混淆主体与非主体的地位,以私人激励为名取消集体和全局的利益,以私企活力为名抹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否坚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坚持政府主导下的“两只手”耦合,正是两种市场经济的分水岭。中国的命运只能寄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上,此乃历史的选择,为使中国沿着康庄大道大踏步前进,必须扫除新自由主义影响,也决不能让西方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圈套所束缚。^[22]

第三,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2013年以来)。2013年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的论断之后,理论界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及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问题、“市场决定”背景下的政府地位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如何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关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及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问题。刘国光提出“微观宏观层次说”,认为“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不同层次,还有许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程恩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的“双重调节”论,主张在分层次分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资源类别和资源配置的长短期区别,并具体地分析了两者在不同层次和领域相结合的应有状态。迟福林等学者提出“市场决定”全覆盖论,认为“不仅市场决定增长、市场决定经济转型、市场决定经济活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为政府’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张卓元提出效率和公平分属论主张市场调节遵循效率原则,政府承担促进公平之责。二是关于“市场决定”背景下的政府地位问题。以程恩富为代表的政府和市场双高双强论认为,今后应将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洪银兴等学者的强市场强政府论;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提出的有效市场有效政府论;林毅夫等学者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论;迟福林等学者提出了“市场决定的有为政府”论。三是关于如何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刘国光、卫兴华、程恩富等学者提出综合推进说,主要特点是提倡完善市场体系、推进政府

改革和其他改革综合推进,并不认同政府改革是“重点”或“核心”,在表述上还往往将完善市场体系置于最前端。吴敬琏、张卓元、佟玉华等学者主张政府改革核心说和政治体制或政治制度改革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争,关系到如何全面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和论争还会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23]以史为鉴,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理论问题的争论,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四、“西学”为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 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及启示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发展,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见解。16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家主张政府对商业流通领域和关税进行干预,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干预思想占主导地位。以魁奈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在18世纪中叶提出“政府之手”学说,既主张自由,又强调“政府之手”的干预作用,并将二者相结合,给后世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政府干预”的模型框架。以“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出“有限政府”学说,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市场观念,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完善的市场体系像“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社会经济活动,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职能保持一个有限的规模,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主张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国家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之以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推行管理,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凯恩斯在与哈耶克关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更有效还是政府的有形

之手更有效率的论战中占据上风。新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时主张哈耶克的观点,反对政府的全面干预,要求恢复市场的自然秩序,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应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有很多,如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伦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都倡导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出现低通胀率和高失业率之后,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既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合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又在吸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了新水平。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并非完全排斥,目前其正在逐步地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西学”为用,是指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要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扬弃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成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完善及至逐步走向衰落等阶段,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也相应地随之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政府调节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崇拜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民主政治制”。这些学者要么弱化政府的作用,倡导西方的“守夜人”理论;要么忽视政府的作用,倡导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是基于国情的不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点是与西方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我们应当认识到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和服务的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加以批判之后坚决抛弃,以免这些理论

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五、启示：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

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为指导思想,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历程,厘清理论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争论的历史,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可以确保我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健全,是一个在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企业管理方式、国家治理方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通过政府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遭到取消和限制阶段(1949—1978年),政府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发挥辅助作用阶段(1978—1992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2013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阶段(2013年至今)等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实现了“六大转向”,^{[24]([17])}即政府管理方式从“干预”本位转向“治理”本位、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从“全能”本位转向“有限”本位、从“规定”本位转向“规则”本位、从“指令”本位转向“指导”本位、从“审批”本位转向“监管”本位,逐步形成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从当前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遵循好价值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完善“强政府、旺市场、壮实体、健金融”架构,^[25]政府要以正确的宏观调控引领市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要运用好金融手段,扎扎实实地发展实体经济,让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不断升级,尤其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后几年,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的调整,应当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发展时期,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9.
- [2]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05-28.
- [3]刘明松.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目标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杨承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习近平.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07-09.
-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 [1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4]郭军.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演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3).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8]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吴敬琏.改革回归市场化才是正途[N].社会科学报,2011-09-08.
- [21]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J].学术月刊,2011,(3).
- [22]杨承训,张新宁.矛盾深层:两种市场经济的分水岭——评“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之“无为而治”论[J].海派经济学,2011,(4).
- [23]习近平.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6-27.
- [24]李琪.政府与市场作用新定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25]杨承训.完善“强政府、旺市场、壮实体、健金融”架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4).

责任编辑:图 图

Issues for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ng and improv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crucial part in building up and develop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irst, we should have a solid comprehens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Prevailing misinterpretation or mistaken understanding of key issu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calls for a master grasp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Besides, we shall summariz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reviewing failures and achievements and studying on realistic issues. Apart from that, we shall clarify the subjects that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als with.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the social aspect of productivity, crucial factors of productivity and how to bring into play the capacity of all productivity factors.(Wei Xing-hua)

On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eorie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eories co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 in the tim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 theories is markedly featured with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adeptly absorbing traditional wisdom.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ness, openness, and sharing put forward a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embodies the new outlook, new recognition, new outline of Xi Jinping's view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concepts hav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initiation, practice, accumulation and upgrade, incorporating Xi's deep study and scientific ref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 for a long run.(Zhong Xiang-cai)

The Systematic Productivity Protec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Xi Jinping inherited and elevated Mao Zedong's ideologies on safeguarding productivity. He uncovers the underlying rul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feguarding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productivity i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d sketches a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productivity mechanism. Xi's theory innovates and enriche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bodies the incorporation of economic, natural and social rules,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risk prevention.(Yang Cheng-xun)

On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Comprehensive" was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er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the course of comprehensively furthering reform, the emphasis lies in the reform of economic institution, whose central issu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o uphold Marxism as the soul refers to its guidance on our studies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while to uphold Chinese knowledge as the body suggests thoroughly studying significant issues accompanied with establish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antly stressi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orientation, voluntarily fac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proxies as a key to opening a new page for work. We should always draw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review and clarify relevant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RC, have an accurate grip on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reference of western theories, we should absorb and apply its rational parts and abandon vulgar part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ics.(Zhang Xin-ning)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It is barely imaginable to build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out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Maintaining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a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smoothly promoting the socialist undert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could undoubtedly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iguring out all supporting conditions for the CPC's correct leadership in promoting the socialist undert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a significant perception for probing the rules of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by summarizing the CPC's ideologies and experience of maintaining correct leadership in the periods of revolution, foundation and reform and refining their thoughts on how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most people, correct method of unified and uniform leadership and correct method of playing out the role of leaders from all levels.(Yuan Feng)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Ou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orge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That is, supply decides demand, while demand in return affects suppl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governmental policy making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dmittedly, we have gained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till can not effectively accommodate people's increasing demand for cultural products. To be specific, there are four contradictions: laggard supply vs. robust demand, unbalanced supply vs. even demand, invalid supply vs. practical demand, and monotonous supply vs. diversified demand. It is urgently needed to launch a demand-oriented supply-side reform in deepen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o promote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long run.(Li Hai-juan and Gu Jian-guang)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Its Refle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urban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t is a practical topic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grassroots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 In contemporary domestic grassroots governance, "government absorbing society" demonstrates a governance pathway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ntinuit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 "government absorbing society" varied from time to time, whose significance should be comprehended in social relations."Government absorbing society" fundamentally implies "grassroots or community returning to society". Its achievement relies on human-oriented multilevel social service network. Its mechanism is the interaction amo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taff of social service. And its target is to accomplish orderly soci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urrent power sequence and institution framework. Nowadays,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orm suggests less a (de-) administrative issue than how to clarify the subjective relationship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its linkage mechanism.(Yang Jun and Ji Xiao-lan)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n August 2016, *The Guidance on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Robust and Order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first proposed "the developing pathwa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lluminating a clear-cut direction for next ste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six musts. We must hol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o diversified modes, to serving the public, to self-administration by law, to "Two Hands Grasp" principle, and to the mass line. The crux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ctively guiding th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modifying beneficial polici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validating the mechanism of registration, inspection, and withdrawal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reinforc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capacity of self-improvement, build up a multidimen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rectifying the CPC's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a grand strategic mission to deepen the knowledge of the necessity,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reform the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o promote their robust and ordered development.(Zhao Yu-xin)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ism Trend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dividualism is an important trend for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dividualism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in our society.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sm has brought quite a few social issues while it safeguards individual rights and liberalization. Individualism breaks down personal attachment to community, mitigates collectiveness in social life and other dominant socialist values, triggers crises of 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ocialist values recognition, and leads to the indifference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demise